

# 大卫·哈维“全球霸权转移” 思想批判性考察

——基于“时间—空间修复”分析视角

李雪阳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广州 510635)

**摘要:**在哈维看来,作为一种“外在转化”方案,“时间—空间修复”在全球引发了两类普遍性后果:一是令世界资本主义保持相对稳定;二是西方被置于“第 22 条军规”悖论中,全球霸权发生转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对于哈维这一思想需辩证看待:一方面,由于“仿效”被狭隘化为“经济仿效”、过度看重“工业化”指标、忽视对西方“反仿效”力量和“时间—空间修复”剥削压迫性内涵的剖析,该理论实难揭示大国权力更迭及霸权转移的内在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尽管在霸权转移前景议题上哈维呈现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调,但因其熟稔资本—帝国主义内在逻辑、历史进程及现实实践,客观上为中国和平崛起敲响了警钟。

**关键词:**时间—空间修复;全球霸权转移;仿效;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21)04-045-09

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何以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面对这个谜一样的难题,列斐伏尔(Lefebvre)指出,资本主义是通过空间生产而得以生存下来的。基于此,哈维(David Harvey)进一步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时间—空间修复”。他指出,作为一种黑格尔式的“外在转化”解决方案,“时间—空间修复”具有难以回避的“非彻底性”和“暂时性”,“资本主义的问题无法在一瞬间通过某种‘时空修复’的魔术来解决”,<sup>[1]658</sup>于是,在全球引发了两类“普遍性后果”:一是新的“时间—空间修复”地区被不断开启,世界资本主义因成功实现“危机转移”而保持整体相对稳定;二是西方主导国被置于“第 22 条军规”(catch-22)悖论之中,<sup>①</sup>进而,由于新资本积累区实现快速发展迟早必将同西方发生竞争性对抗(形式主要为争夺新的“时间—空间修复”地区、贸易战、货币战等),甚或引发军事冲突,全球霸权发生转移的可能性亦随之增大。然而,一方面,由于在哈维这一基于“时间—空间修复”分析的“全球霸权转移”思想中,“仿效”被压缩和扁平化为一种纯粹的“经济仿效”,“工业化”被视为国家权力变化及霸权转移的“关键指标”,西方“反仿效”力量和“时间—空间修复”剥削压迫性内涵未能得到深刻揭示,哈维并不能真正揭示国家之间权力更迭和地区或全球霸权转移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在霸权转移前景议题上,与以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为代表的和平观相较而言,尽管哈维“修昔底德陷阱”式的论调令人深感不安且难以接受,却更加符合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现实,并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敲响了警钟。

收稿日期:2020-08-12

作者简介:李雪阳(1979-)男,江苏南京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一、“时间—空间修复”的“非彻底性”和“暂时性”及其引发的两类“普遍性后果”

尽管实为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的“时间—空间修复”被证明是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缓解和推迟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一种相对有效方式,不过,在哈维看来,与黑格尔曾经提出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路径一样,“时间—空间修复”实为一种抛弃了“内在转化”理念的“外在转化”解决方案,因而具有显而易见的“非彻底性”和“暂时性”。正因此,其将在全球引发两类“普遍性后果”:第一,新“时间—空间修复”区域被不断开启,从而产生了一种总体效果,即令世界资本主义整体暂时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第二,西方主导国不仅将被置于“第22条军规”悖论之中,更将被置于全球霸权转移可能性持续增大的境遇之中。

### (一)“时间—空间修复”作为一种“外在转化”解决方案的“非彻底性”和“暂时性”

哈维始终坚信,帝国主义的逻辑应当且必须被置于为剩余资本寻求“时间—空间修复”的背景下进行理解。“时间—空间修复”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从理论上讲,它来源于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不断下降并导致过度积累危机这一理论的重新阐释,“这种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接踵而至的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要想避免资本盈余贬值,必须寻找赢利方式来吸收这些盈余……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选择”。<sup>[2]73</sup>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过度积累问题的相对而言比较有效的途径,“时间—空间修复”由“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两个部分构成并内含三种修复方式:(1)时间修复方式,指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2)空间修复方式,即通过拓展新的市场,调整整合新的资源和产能等市场要素实现过度积累的空间转移;(3)时间—空间修复方式,即以某种形态将(1)和(2)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过度积累的时间转移和空间转移。<sup>[2]89-90</sup>为了更为具体地阐释“时间—空间修复”机制,哈维从资本流通“三级循环”视阈进一步做出了详述:首先,当剩余资本从直接生产和消费为主的初级循环中流出之后,要么涌入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所构成的第二级循环,要么涌入以社会支出和科技研发为主的第三级循环,从而使剩余资本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转移。在资本第二级循环中,剩余资本涌进两个不同领域:一是被投入固定资本中,如楼房厂区、机器设备、路桥港口、供水系统、发电站等;二是创造了消费基金,如住房(还有二者兼而有之的情况,如高速公路,既可以为生产活动服务,又可以为消费活动服务)。在资本第三级循环中,剩余资本亦涌进两个差异性领域:一是直接投入以生产为基本导向的科技研发或技能培训领域(如教育、卫生保健等);二是投入到这些领域的固定资本中,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设施、设备仪器等,以提升这些领域的设施条件和保障水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级循环(例如卫生保健预算)经常会吸收巨额资本,”“该种投资的其中一部分可能还被认为具有有效的区域稳定性,”“比如说教育系统,一旦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被从行政和财政上组织起来之后,它就很难再四处移动”。<sup>[2]91</sup>总之,哈维认定,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爆发过度积累危机,即出现劳动过剩(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资本过剩(表现为市场上大量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的商品,或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以及缺少生产性和赢利性投资的货币资本的过剩)现象时,资本主义系统必将倾向于采用“时间—空间修复”机制来推动实现过度积累的时间—空间转移,以使过度积累得以被快速有效吸收。

不过,在哈维思想深处,“时间—空间修复”决非一种能永久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过度积累危机的有效方式。尽管这一方式在一定时期或范围内能有效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过度积累问题,然而,它内在具有难以回避与逾越的“非彻底性”和“暂时性”。在《资本的限度》一书中,为了解答既然马克思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倾向于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如在《资本论》的大多数地方,马克思

似乎都排除了对外贸易和殖民贸易)那么为何《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却仍然展开了对“现代殖民理论”探讨这一疑问。哈维对《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了比较研究后指出:第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擘画的致力于解决市民社会内部矛盾或危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路径实为一种抛弃了“内在转化”逻辑的“外在转化”方案;第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不仅放弃了对“内在转化”与“外在转化”这两种过程之间辩证关系的描述,而且未能确切指明市民社会能否通过作为“外在转化”方案的地理—空间扩张来永久解决其内在矛盾;第三,“鉴于马克思十分喜欢与黑格尔的幽灵格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展开“现代殖民理论”探讨很可能是希望对黑格尔悬而未决的议题给予解答:虽然“外在转化”方案能提供新的市场,但必须付出的代价却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和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机制再次创造出来,这不过是把原初引发内部重重矛盾的条件重又复制出来。所以,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危机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某种“内在转化”路径,即迫使社会放弃为积累而积累的做法,并设法发动自然的和人类的力量来追求一种只有超出“必然王国”才会开始的自由。<sup>[1]634</sup>对此,哈维总结道:“马克思拒不承认殖民化(或通过任何空间定位进行扩展)会最终成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行之法,他显然不得不关闭了黑格尔那还有些微敞的大门,并加强了对总体革命的号召”。<sup>[3]</sup>由于同样高度依赖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方式缓解资本主义积累危机,“时间—空间修复”无疑与黑格尔提供的所谓“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路径一样同为一种抛弃了“内在转化”的“外在转化”解决方案。因此,在哈维看来,“时间—空间修复”同样也不是一种彻底化解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有效方式,它内在具有“非彻底性”和“暂时性”。诚如马克思曾深刻揭示的:这一机制自然不能彻底而恒久地解决资本主义内在困境,尽管其在一段时期内看起来是一种解决方案,然而,却会在长期变成它的反面。<sup>[1]635</sup>

## (二) “时间—空间修复”在全球引发的两类“普遍性后果”

正是由于作为一种“外在转化”解决方案无法回避和逾越的“非彻底性”和“暂时性”,“时间—空间修复”不仅无法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困境,而且在全球引发了两类“普遍性后果”:第一类“普遍性后果”是,由于积极推动“时间—空间修复”,出现内部过度积累现象的特定区域实现了资本的时间延展和空间转移,剩余资本寻觅到新的赢利性项目和场域,有效避免了贬值且被有效吸收,从而产生一种总体效果,即暂时降低了过度积累及贬值所引发的致命威胁,使世界资本主义整体上得以保持一种相对稳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1980年左右以来所经历的地区移动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一类型,尽管这种变动性是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为了金融资本、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的利益而故意操纵的(如果不是控制的话)”。<sup>[2]99</sup>第二类“普遍性后果”,是推动“时间—空间修复”的西方主导国不仅将被置于“第22条军规”悖论之中,更将被置于全球霸权转移可能性持续增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西方通过“时间—空间修复”这一“外在转化”方式使其内部过度积累问题得到暂时缓解,世界范围新的“时间—空间修复”场域亦被不断开启,“时间—空间修复”却无法真正解决过度积累问题,不仅西方主导国仍然需要在全世界持续不断地推进“时间—空间修复”,而且曾经作为新的“时间—空间修复”场域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堪面对其内部过度积累困境的情形下也将或迟或早走上“时间—空间修复”之路,在全世界积极寻觅尚未被开启的“时间—空间修复”场域。这样一来,世界范围内能有效吸收大量剩余资本的地理空间将越来越少,西方推动的“时间—空间修复”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西方主导国之间、西方主导国同作为新的“时间—空间修复”场域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以及尚未被纳入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对立矛盾、竞争对抗势必愈演愈烈,西方帝国主义在“门户开放”、自由贸易与保守封闭、在帝国内部实行自给自足等政策之间犹豫不决的程度将随之不断上升,“由于资本积累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将最终产生剩余,并将通过地理扩张来寻求吸收这些剩余,因此新的矛盾将会出现,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

来,日本和德国的资本成为美国资本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与美国资本在20世纪超越英国资本非常相似”,<sup>[2]97,98</sup>哈维甚至断言,全球化时期,世界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某种所谓的“次级帝国主义”,其不仅对传统西方主导国构成了越来越难以忽视的强劲挑战,而且使得全球霸权转移(包括区域性霸权转移)的可能性逐年攀升,“随着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强大态势面前在世界舞台上相互竞争,国际竞争正呈现出越来越猛烈的态势”,<sup>[2]101</sup>“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为其他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创造了机会,这种融入最初是作为剩余资本的吸收者,随后便是剩余资本的生产者,由此它们也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竞争者,随着每个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心均通过划定势力范围来为自己的剩余资本寻找系统的时空修复,那种所谓的‘次级帝国主义’不仅已经在欧洲,而且已经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出现了”。<sup>[2]149,150</sup>

## 二、哈维基于“霸权”概念双重内涵的“经济仿效”观及其理论缺陷

循着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阿瑞吉的思想理路,哈维同样将“霸权”视为一种既包含“强制”意蕴同时又包含“许可”意蕴的“领导权”。据此,“霸权”常常被用来指代这样一种情形,由于起支配作用的霸权国家一直扮演领导角色,其必将对众多被领导国家产生难以抗拒的示范效应,成为被领导国家“仿效”的典范并将其他国家引上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相较于阿瑞吉全面而辩证的“仿效”观,第一,哈维仅仅将“仿效”局限于经济生产领域,从而使得“仿效”狭隘化、扁平化为一种单纯的“经济仿效”;第二,哈维“经济仿效”观及由此推导得出的“全球霸权转移”思想呈现出简化单一性和机械僵化性。

### (一)“霸权”概念双重内涵与“仿效”——从葛兰西到阿瑞吉

在阿瑞吉看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再现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权力乃是“强制”与“许可”结合体的政治观传统,即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既有“强制”因素,也内涵“许可”因素(类似葛兰西的“知识和道德领导”)。“主宰权将被看做主要依赖于强制,而霸权将被视为统治集团由于它能将所有引发激烈冲突的问题置于一个‘共同’层面而获得的额外权力”。<sup>[4]32</sup>如依循这一政治思想传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国家霸权”无疑将不同于主要建基于“强制”之上的“国家主宰权”,而更多地应被理解为一种同时包含了“强制”和“许可”意蕴的“国家领导权”。对此,阿瑞吉指出,“国家领导权”这一术语常常被用来指这样一种情形:“一个支配国引领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在追求一种普遍利益……如果未来霸权国声言代表如上规定的体系普遍利益,那么其主张就可能得到信任,其权力就会在两种条件下膨胀:第一个条件是,这个国家的支配集团已经发展起这样一种能力,能够领导体系向国家间合作和劳动力分配新形式的方向发展,这将使得体系中的各单位能够突破沃尔兹所说的‘小决策的僭越’(tyranny of small decisions),即克服各个国家只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不顾需要从体系层面来解决体系层面问题的这一倾向……第二种条件是,未来霸权国提供的体系层面的解决方案必须致力于体系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使得体系中现存或新兴的支配集团深切并且广泛地感觉到‘需要’系统的治理”。<sup>[5]32-34</sup>

由于霸权国家长期处于支配和领导地位,声言代表一种体系的普遍利益,特别是其经济生产、科技能力、社会文化、军事力量等综合国力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霸权国家往往对众多被领导国家和地区产生难以抗拒的示范效应,并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觉自愿地在几乎一切方面仿效霸权国家,以至逐渐走上霸权国家的发展道路。因此,“国家领导权”这一术语还被用来指这样一种情形,“一个支配国家通过自己的成就,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并将其他国家引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可能会提高支配国的声望,从而增加它的力量”。<sup>[5]32</sup>当然,另一方面,“仿效”亦可能逐渐将霸权国家的领导权转变

为一种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深为担忧的“违反自身意愿的领导权”,“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领导权日趋激化权力竞争,因而缩减了、而非膨胀了霸主的力量”,<sup>[5]287</sup>如果被领导国家对霸权国家的仿效获得(完全)成功,那么,毋庸讳言,霸权国家自身称霸的“特殊性”则因树立了一个竞争者将遭到削弱,其霸权力量亦将呈现一种越来越紧缩而非膨胀的态势。

## (二) 哈维“经济仿效”思想及其不足

由于深受葛兰西、阿瑞吉“霸权”思想的影响,哈维的“霸权”概念同样是一个既包含“强制”因素,也内涵“许可”因素的政治学范畴。在考察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议题时,哈维分别从“强制”和“许可”两个维度对此做出了阐释:一方面,他描述了二战结束迄今数十年间美国是如何在国内及全球积极推行霸权中的强制性(反动)力量的;<sup>[2]33</sup>另一方面,他反复强调,“强制和肃清敌人仅仅是美国霸权的一个局部的,有时甚至是起反作用的基础”,“认同与协作是美国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权力基础……如果美国不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同与协作,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认同与协作来行使领导权以实现集体利益,那么美国早就丧失了霸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通过认同而行使领导权”。<sup>[2]34</sup>与此同时,哈维亦深受阿瑞吉“仿效”观影响,只不过,哈维的“仿效”思想及其有关推论呈现出简化单一性和机械僵化性:首先,本来具有多维度、多层级内涵的“仿效”概念,由于他过度关注和强调资本积累和经济生产而被牢牢局限在一种以“时间—空间修复”为内在动力机制的资本—经济视阈之中,换言之,“仿效”仅仅被狭隘化、扁平化为一种单纯的“经济仿效”;其次,哈维秉持的只要以“时间—空间修复”为内在动力机制的“经济仿效”获得(完全)成功,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必将发生某种程度或范围转移的观点,不仅背离了他关于“权力的领土/政治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具有根本差异且无法实现简单转化的立论基础;而且,一方面他将众多“内在”影响因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能源资源储量、地理地貌、工业化程度、文化教育水平、科技研发能力、军事国防力量等)置于考量之外,另一方面则忽略了影响霸权转移的众多“外在”因素<sup>②</sup>,从而令其分析和推导逻辑严重缺乏系统性和辩证性。譬如,在国际关系视阈中,“其他大国以及中小国家都成了‘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它们对‘主导者’与‘竞争者’之间的‘权力转移’关系似乎毫无意义……‘系统因素’本来应该是足以影响和改变‘主导者’和‘挑战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的基本变量”,<sup>[6]37</sup>但是,在哈维这里却被“惊人地省略掉了”。

同哈维简化单一、机械僵化的“经济仿效”思想有所不同,阿瑞吉却始终对“经济仿效”改变旧霸权世界体系格局,以及霸权国家和受支配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及效果,秉持一种较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仅仅通过“经济仿效”必将导致霸权发生转移这样一种推论并不认同。在阿瑞吉看来,全球化时期,东亚和东南亚(主要为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资本积累最富活力中心的兴起,而非苏联的垮台,将被证明是“我们时代意义最为深远的事件”,<sup>[5]289</sup>不过,倘若从其他众多非经济因素(如地理地貌、自然资源、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等)来看,东亚、东南亚所拥有的“立国能力”和“战争能力”仍无法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相抗衡,更遑论挑战西方世界霸权体系。这一点诚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坦言的那样,事实上,日本是“一个极度虚弱的国家”,它最根本的弱点是“能源、食物和军事安全”。<sup>[4]17</sup>如果从一种系统性视角进行观察,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霸权体系内谋求自身发展(要么严重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要么严重依赖美国能源物资或广阔商品消费市场),短期内既无法彻底脱离这一体系,更无力重构重塑另一种崭新的体系。对此,小泽辉智指出:东亚劳动力寻觅型投资和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实际导源于战后早期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贸易体制。该体制使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经济奇迹般的结构改革和升级成为可能,继而,日本经济奇迹成为整个东亚地区工业扩张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时至今日,整个东亚资本主义群岛仍依赖美国世界霸权体系并继续“为富裕市场提供体现穷国廉价劳动力的产品”。<sup>[4]383</sup>阿瑞吉断言,倘若“要说出新兴的东亚积累体系在摆脱旧的(美国)体系的过程中

最后将会产生什么结果,现在还为时太早”。<sup>[4]387</sup> 迄今为止,作为全球资本积累最富活力的新中心的东亚尚不足以担负起世界霸权主导国的重担,更难以以为美国旧霸权遗留下的体系问题提供新的良好解决方案,“现在还没有强大可靠的新力量足以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促使其走向崩溃……这是一个东亚国家的支配集团几乎还不能承担的艰巨任务”。<sup>[5]315</sup>

### 三、“工业化”难以成为判断国家间权力变化及霸权转移的“关键指标”

不同于国际关系领域一度盛行的“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 theory),由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y)创建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学说认为,大国间力量再分配的均衡而非力量再分配的差异更容易导致“主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爆发激烈对抗、冲突,甚或战争。在奥根斯基看来,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差别巨大,而这恰恰是权力变更的基础,这些表现可概括为:是否启动和顺利实施工业化,以及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转型是否能有效地支持工业化尽快发展,政府是否能通过提高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来推动工业化的持续发展。这一系列因素(核心为工业化进程)已成为判断国家间权力变化的“关键指标”。<sup>[6]</sup>

在反驳阿瑞吉“仿效总是产生竞争且总是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观点时,哈维提出了在经济生产领域中需加以区分的两类“仿效”:一类“仿效”主要指资本流动和资本积累,其“促使更大的合力得以形成”,即由于“时间—空间修复”机制持续运行,世界资本主义保持相对而暂时的稳定;另一类“仿效”则指工业化进程,其必将提升“仿效国”综合实力并促使其与“主导国”之间出现竞争与对抗,甚或令“仿效国”同“主导国”之间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如中国台湾从美国手中接过某些工业生产以及美国国内长期以来在钢铁、造船、纺织等领域去工业化均带来了这样的后果。<sup>[2]36</sup>由此可见,哈维不仅忠实继承了“权力转移”学说“内在因素论”(而非秉持一种“外在因素论”),而且更忠实继承了“权力转移”学说中将工业化进程视为国家权力变更基础且以工业化进程为判断国家权力增长核心指标的基本思路。

然而,在考察全球霸权转移议题时,即便是抛开由于缺失“外在因素论”考量从而难以解释某些历史和现实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困境,“权力转移”学说聚焦的“内在因素”也由于过于狭隘单一而长期备受诟病,“即便是‘内部’变量,导致国家间权力对比变化的因素也并不仅仅是奥根斯基所强调的‘工业化’和不均衡的GDP增长率,例如,在大国间GDP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国家对实力建设的投资选择,对国家间相对权力的变更具有重要的影响”。<sup>[6]</sup> 迄今为止,许多学者仍在不断修正权力转移最大影响因素是“内在工业化进程”这一观点,如威廉·汤普逊(William R. Thompson)认为,海军力量发展及海军力量相对实力对比,才是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导致权力变更最重要的因素。<sup>[6]</sup> 全球化时期,作为“权力转移”理论核心指标的工业化进程及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次级指标”,如“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量”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不适应性,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IT技术为主导的全球化高速扩张的今天,再继续用这套‘前全球化’、‘前工业化’时代的数据来定义国家的权力与能力几乎是无法想象的”。<sup>[6]</sup>

阿瑞吉同样也不认同国家权力变化及权力转移根源于“内在工业化进程”的观点。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阿瑞吉指出,工业增长率或狭义生产率,并不能非常可信地说明国家在提高竞争优势的斗争中是会成功还是会失败。历史表明,在缺少别的更加基本因素的情况下,快速工业化不会以相应程度缩小现存附加值的差距,反而将加剧资本的剥削压迫,使劳工阶级深陷低收入泥沼并持续拉大社会阶级之间收入及财富鸿沟。基于这样的认知,阿瑞吉指出,过去二三十年里,使东亚经济扩张的(或东亚经济奇迹),并不是快速工业化本身,而是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附加

值等级和剩余资本等级向上移动。在一段时期内,“从这两点来看,日本的成就要大大胜过东亚内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获得较大部分世界收入和流动资本的速度和程度,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的相对人均收入的增幅已经比较巨大,但它在世界附加值中所占份额的增幅还要巨大……更重要的是,一个数目巨大的人口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多层结构中如此惊人升级的同时,它在巨额融资领域里也取得了同样惊人的进展”。<sup>[4]369</sup>阿瑞吉的结论是,东亚奇迹仅仅用该地区工业持续扩张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至少是不可靠的。东亚崛起成为全球资本积累新中心,是因为它的几个辖区已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附加值和世界金融等级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展。

#### 四、西方“反仿效”力量与“时间—空间修复”的剥削内涵

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唯有让全球广袤的非西方、非资本主义区域完全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即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一揽子式”地对西方进行“经济仿效”,才能最大程度地有利于西方,“这似乎是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问题的唯一办法”。<sup>[1]662</sup>然而,阿瑞吉却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提请人们注意来自于西方的强大“反仿效”力量。<sup>[5]</sup>他通过回顾西方数百年殖民战争和殖民统治史指出:历史表明,西方一直高度警惕和戒备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进程,换言之,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对西方而言实为一种强劲挑战同致命威胁。所以,西方内部长期存在着强大的防止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仿效的“反仿效”力量。

毋庸讳言,尽管哈维“一揽子”“经济仿效”观在“原理”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然而,由于他未能辩证看待西方垄断资本竭力保证自身利润最大化同维持全球霸权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只能在“现实性”上“失之东隅”。哈维“一揽子”“经济仿效”观中对西方“反仿效”力量分析的“惊人缺失”决非偶然,这源于哈维在其或隐或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对作为“经济仿效”内在动机机制的“时间—空间修复”的中立性认知。这一理论特征往往使人或忽视或忘却:第一,“时间—空间修复”的启动者、主导者、受益者主要是西方垄断资本,面向广袤“第三世界”推行的“时间—空间修复”实为一种具有显著剥削压迫内涵的“资本输出”;第二,“时间—空间修复”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范围内助推“第三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不过,其远非“中立”或“无害”的。从一个长时段或结果视角来看,一方面,这无疑更加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另一方面,必将对“第三世界”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外国资本的专横给落后国家留下的只是原料产地的空山废矿和变为雇佣工人但又丧失了劳动机会的新的大批生产者”;<sup>[7]</sup>第三,“时间—空间修复”对“第三世界”“仿效”西方所起到的有限正向作用往往是在西方强大“反仿效”力量(如高新科技垄断、专利权保障等)宰制下艰难推进的,这样不仅“第三世界”无法实现“一揽子”“经济仿效”,而且更不可能导致仿效方与被仿效方之间发生激烈竞争对抗,以至令世界霸权、地区霸权动辄发生某种转移(新的资本积累中心绝不会因为仅仅获得一些资本输入及由此推动的某些微不足道的“仿效”而有力挑战或重构重塑这一世界秩序),恰恰相反,“第三世界”有限的“经济仿效”在或被动接受西方淘汰科技和落后产能,或沦为外包加工产地等过程中,不断维系巩固着世界不平等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不平等生产分工格局。

#### 五、全球霸权转移前景——“修昔底德陷阱”抑或一种和平通途?

自“修昔底德陷阱”观点提出以来,这一理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其并不具有严肃的学术性而毋宁说更像一种战略性宣传或一种人为制造的话语陷阱。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

·科什纳(Jonathan Kirshn)从历史学角度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对修昔底德的一种误读,是从表面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存在着巨大战略误导危险。具体到中美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明确指出: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两国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sup>[8]</sup>一些学者则根据“权力转移”学说提出,一般而言,挑战国或崛起国通常可以被划分为“满意国”和“不满意国”两种类型,中国实为现阶段国际秩序的“满意国”,因而,不大可能同美国发生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军事战争。<sup>[9]</sup>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在考察和讨论美伊战争和美国全球战略议题时,清晰地描绘了一幅作为未来挑战国或崛起国的中国同作为传统西方主导国的美国爆发军事战争的场景。这表明,尽管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首度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2012)要晚于哈维《新帝国主义》(2003),然而,在大国关系议题上,哈维早已阐述了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换言之,在他看来,崛起挑战国(如中国)与传统守成国(如美国)之间的霸权转移几乎很难通过某种和平方式得以实现,激烈的竞争对抗,甚或爆发局部战争乃至全面战争似乎才是问题的唯一解决方式。

不同于“修昔底德陷阱”见解,阿瑞吉提出了一种超越“修昔底德陷阱”预言的和平转移可能性前景。阿瑞吉认为,全球化时期,东亚的快速崛起同西方传统主导国的普遍衰落是两个无可避免的基本演变趋势,“这一地区在一个有条不紊的国家(日本)和一个商业流散团体(海外华人)‘看不见’的领导之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和世界钱箱,这给西方文明各主要中心带来普遍的‘衰落的恐惧’,西方即将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号施令的地位退下,这不仅可能,甚至是很可能”。<sup>[5]314</sup>西方主导国的普遍衰落以美国“外强中干”军事力量持续衰微为重要表征,据此,他建议西方应重估自身综合实力。阿瑞吉进而指出,一方面,多年来,由于美国在高度依赖遍布全球且耗资巨大的军事设施以及高度依赖浪费且难以维系的大众消费模式的扩散两个方面无法真正获得改观,因而,其以征收高额保护费用和过度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全球霸权是难以为继的;另一方面,由于东亚已经且仍在继续向全世界呈现出一幅比美国全球霸权体系更为经济、更加持久的发展前景,因此,未来取代美国全球霸权的应是朝向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某种“回归”。这一世界体系不仅将彻底克服美国霸权体系的弊端,而且拥有倡导多国相互合作且主要依靠“道德训诫”而非“强制力量”为核心治理原则及实践方式的能力。<sup>③</sup>在阿瑞吉看来,未来全球霸权和平转移的主要途径为:呼吁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在面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经济力量强势崛起时,自觉努力调适并积极扩展其内在经济政治包容性,“如果对于东亚地区的新兴经济力量,美国能够调整和容纳,这是不遭遇大灾难就向新世界秩序转变的关键条件”。<sup>[5]315</sup>

事实上,在讨论大国关系及霸权转移议题时,无论是坚称军事战争为唯一前景的“修昔底德陷阱”观点,抑或是坚称基于理智与包容等因素之上的和平转移为唯一前景的见解,毋庸置疑均为一种对历史过往的经验性归纳与总结(历史地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转移时既有爆发激烈军事冲突的案例,亦出现过和平转移及逐渐过渡的案例),因而,倘若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均须接受休谟“因一果怀疑论”的质问。由于深度依赖历史事实和历史信息,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观抑或是和平转移观,都既难以成为一种先验性理论分析框架,也难以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规律性论断。在霸权转移前景这一议题上,唯有实践性、历史性地获取认知并不断纠正错误这样一条道路可行。当然,阿瑞吉所展望的霸权和平转移前景无疑非常具有吸引力,不过,他所提出的和平前景主要依赖的实现途径却令人感到虚幻且疑虑重重:第一,面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经济力量的强势崛起,西方倾向于选择合作共赢还是打压封锁是不确定的;第二,即令西方选择合作共赢,它们经济政治包容度究竟能有多大仍是未知的;第三,全球新经济力量和平崛起是否与西方垄断资本的旨向诉求、利益追逐根本冲突,如若尖锐对立,西方垄断资本能否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调整同足够包容也是很难预判的;第四,既然阿瑞吉通过回顾西方主导国之间数次权力更迭及霸权转移的历史进程后,最终得出了旧体系崩溃与霸权发生转移既源于



“新进攻性力量”的出现,同时更源于衰微霸权主导国“不愿意调整和容纳”的结论,那么,他凭什么推断作为当今世界霸权主导国的美国会走上自觉自愿的“调整和容纳”之路?总之,阿瑞吉提出的这样一种争取和平转变前景的方式路径应当说严重缺乏对资本—帝国主义历史进程、现实实践,特别是其内在且一贯的贪婪性、残暴性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理解,从而由于严重脱离客观实际而显得幼稚和抽象。相较而言,尽管哈维“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黯淡前景令人不安惶恐且难以接受,但是,一方面,这至少表明哈维深谙资本内在逻辑,熟稔帝国主义历史进程和现实实践,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贪婪和残暴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哈维的这一立场客观上也起到了为中国和平崛起敲响警钟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过程中应尽可能走和平之路,但这却不能成为忽视存在爆发战争可能性的理由,中国必须贯彻“底线思维”。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讨论中美大国关系、相互博弈及国家权力更迭这一议题时,应竭力超越资本—帝国主义霸权思维的狭隘藩篱,彻底摆脱国家权力更迭和全球霸权转移这一理论逻辑及分析框架,明确社会主义中国从来就不希望称霸,将来更不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体系的主导国。恰恰相反,中国始终都在致力于积极寻求与推动形成一种反资本—帝国主义全球霸权及剥削压迫秩序的公正、平等、民主的崭新世界秩序和全球体系。

## 注 释

- ①“第22条军规”悖论源自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基地的一个医院为背景:空军上尉约翰·尤赛林(John Yossarian)对战争和军队腐败的官僚体制感到希望幻灭,试图通过装疯扮癫以停止执行轰炸任务。根据第22条军规的规定,疯癫之后可以停飞,但需要申请。然而,如果个人感到有危险而提出停飞,即说明申请人神志正常,因此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尤赛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停飞的目的,最后只能开小差逃亡中立国瑞典。该词现用来比喻无法逃脱的两难境地。
- ②如范·埃弗拉(Steven Van Evera)指认的国家结盟或外交实践形成的“亲疏远近”国家关系变迁引发的对国家能力状况判断的变化等。
- ③这恰恰是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优势所在,恰如阿达斯(Michael Adas)所言,在18世纪前半期,“对中国风格的狂热不仅限于亭台楼榭和戏剧作品的主题”,“当时一些最卓越的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伏尔泰和魁奈(Quesnay)都从中国寻找道德教化、对制度发展的引导,以支持各自的主张——即仁慈专制(benevolent absolutism)”。

## 参考文献

- [1]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M]. 张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2]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沈晓雷,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3]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杰奥瓦尼·阿瑞基. 漫长的20世纪[M]. 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5]乔万尼·阿瑞基,贝弗里·J·西尔弗,等.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 王宇洁,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6]朱锋. “权力转移”理论: 霸权性现实主义? [J]. 北京: 国际政治研究, 2006(3): 24-42.
- [7]米·德拉基辽夫,格·鲁登科. 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基本特征概论[M].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212.
- [8]陈康令.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话语陷阱[J]. 北京: 红旗文稿, 2018(22): 17-18.
- [9]胡宗山,余珍艳. “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J]. 北京: 社会主义研究, 2017(6): 143-150.

责任编辑: 景玉琴